卢泓钢，王娟，吴连翠．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4）：44-54.
Lu Honggang，Wang Juan，Wu Liancui. Theoretical logic，practical dilemmas，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rural area clustering for common prosperity［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4）：44-54.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4.005

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卢泓钢[1,2]，王娟[2]，吴连翠[1,2]
（1.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300；2.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被视为打破村域壁垒、促进区域共富的关键路径。基于地域再生理论，构建“主体—环境—产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片区组团通过主体重塑、环境营造、产业培育，旨在实现村际资源互补与区域价值共生。然而，实践过程中尚面临“联动之困”“统合之困”“赋能之困”等多重挑战，主要表现为主体协同不足、空间适配失衡、融合发展滞后等，制约了政策的共同富裕效应。为此，提出应以党建联合引领多元主体协同，以空间正义夯实片区组团发展，以统分结合激活产业联动效能，从而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乡村片区组团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照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片区组团；地域再生理论；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61.5；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4-0044-11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与本质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要坚持循序渐进。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一方面，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导致乡村普遍面临生产要素持续外流、村庄布局“小散弱”乃至“空心化”、产业同质化竞争与公共服务供给低效昂贵等多重系统性挑战[1]。另一方面，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传统发展模式易引发“马太效应”，即条件优越的村庄更容易吸纳资金与项目，而条件一般的村庄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加剧了村际发展的不平衡[2]。由此导致农村现实发展路径与全域共同富裕背道而驰。

在此背景下，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是指以重点村为节点，联结周边若干个地理区域相邻、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特色相似的村，推动“重点村＋周边村”组团联动发展，以此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辐射带动，放大集聚效应，推动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该模式通过打破行政村域界限，将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相近、发展诉求相似的村庄进行整合，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乡村片区，旨在实现

收稿日期：2026-01-16 **修回日期：**2026-02-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项目“肥药数字治理‘悬浮化’的形成机制及敏捷调适策略研究”（72503226）；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农业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24YJRCO9ZD-3YB）
作者简介：卢泓钢，研究方向：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联动，从而缩小村际差距，推动全域共同富裕[3-4]。它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更是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发展路径的深刻回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面对这一重大课题，国家政策层面进行了前瞻性的引导与部署，为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早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体现了差异化、片区化推进的思路。2024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继续强调“细化村庄分类标准，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强化了片区化、梯次推进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标志着乡村片区组团从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构建了以“重点村”为节点、辐射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的发展模式，将片区组团发展明确定位为实现“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重要实践载体。这一系列政策部署与实践探索，为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南，也为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在理论层面具有显著优势，且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深入研究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我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为理解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提供了多元视角与重要基础。早期关于区域协同的研究多源于城市群发展，其核心围绕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的辩证关系展开。胡小武的研究表明，在推拉理论作用下，扩张型城市因强大的产业、区位与制度吸引力形成“拉力”，持续吸纳人口与资源；而收缩型城市则因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与制度僵化等原因产生“推力”，导致要素外流与发展乏力。这揭示了区域发展从“均衡”走向“极化”的阶段性规律。在此过程中，中心城市凭借规模经济与集聚优势，对周边资源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在推动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围区域的增长，导致“核心—外围”结构固化与区域差距拉大[5]。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研究发现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动态影响并非简单地遵循“先虹吸后溢出”的线性路径，其具体效应受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资源竞争焦点的深刻影响[6]。根据增长极理论可知，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取决于其发展成熟度与产业辐射能力。当增长极处于快速扩张阶段时，资源集聚效应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增长极进入稳定发展期后，产业外溢效应才会逐步显现，带动周边地区形成梯度发展格局[7]。然而，这一源于城市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范式，能否直接移植并有效解释社会结构、产权关系与治理逻辑迥异的乡村地域协同发展问题，构成了理论审视的首要关切。

国内学者对片区组团的分析多集中在其形成逻辑与制度安排方面，鲜少关注到该实践的经济与共富逻辑。在形成逻辑方面，大多研究一致认为，在当前农村人口外流、产业凋敝的背景下，“单村独建”容易导致产业低端同质、设施重复低效、土地破碎化利用以及治理上的“孤村奋战”，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塑造[8]。因此，超越传统的村庄单元，转向片区化发展模式，被视为破解上述困境、激活乡村整体发展潜能的关键路径。在制度安排方面，早期探索性研究已对产业联动、跨村联建、治理协同等片区发展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基于跨村发展与资源共享理念的“多村联创”机制，可以通过整合乡村自然、生态、文化等资源禀赋，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等多元模式，能够有效推进乡村内生性发展与全域美丽乡村建设，为片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9]。亦有研究提出“整合式共治”的解释框架，认为设立跨村联合党委重构村际关系，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制下的

资源“虹吸效应”，为实现片区均衡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组织创新视角[10]。也有学者通过典型案例剖析了乡村片区组团在基层的实践运作，尤其关注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揭示了治理创新如何促成集体行动[11]。但现有研究对片区组团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关注尚显不足。

在发达国家，关于区域协同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如日本的“町村合并”“广域行政”制度、法国的“领土整治”“乡村合约”模式、德国的“村庄更新”“城乡等值化”实践等。这些国际经验表明，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如何将这些经验本土化，并结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是当前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更强调通过产业联动与资源统筹等缩小村际差距，但其经济逻辑仍需要进一步厘清。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理论整合不足。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展开探讨，未能构建起阐释“组团”与“共富”内在关联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导致机理分析呈现碎片化。第二，机制分析笼统。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应然状态的描述，对片区组团面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及其与治理能力的关联缺乏系统剖析，致使理论对复杂实践的解释力不足。第三，路径设计理想化。既有探讨多集中于宏观规划层面，对权属协调、利益平衡等关键治理约束考量不足，缺乏兼具系统性、操作性与适应性的实施框架。

三、理论逻辑

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的战略议题。

（一）理论借鉴与时代内涵

国际乡村发展理论为我国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早期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发展应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导向，转向以内生动力为核心、社区主体性为根基的可持续模式。该理论认为，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源于社区内部的知识积累、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而非外部资本或技术输入[12]。这一观点与我国乡村片区组团中“强村带弱村”“资源统筹共享”的实践逻辑契合，为理解片区组团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理论支点。日本学者小田切德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域再生理论，其以地域为核心的整体设计思路，旨在通过挖掘、保护与活化特定地区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实现该地区的经济、生态、文化多维度的可持续振兴[13]。该理论认为乡村持续发展首先须具备内发性、综合多样性以及革新性三大特征。其中，内发性是发展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据在地居民的真实意愿推动地域建设；综合多样性是发展的实践内涵，倡导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革新性则是发展的核心机制，强调在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的背景下，通过结构性重组激活乡村运行体系。其次，该理论认为在实践维度要推进三大创造性，即主体创造、场所创造和条件创造。其中，主体创造重在通过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重塑居民的价值认同；场所创造关注硬件设施与软件社区的建设，尤其强调构建超越村庄界限的广域交流网络，促进内外互动；条件创造聚焦于培育能够保全村落资源、吸引人口回流的可持续经济循环。最终，其行动目标指向多元价值叠加。即不仅创造经济价值，更注重整合与提升环境、文化、社会关系等多元内在价值，并通过城乡交流形成价值增值与再生的高阶循环。

地域再生理论为我国乡村片区组团实践提供了多维度的启示。一是其强调的内发性原则与我国乡村片区组团中“自主发展、自我造血”的理念相呼应；二是其综合多样性特征为片区组团提供了差异化发展思路；三是其革新性特征则要求片区组团在实践中注重结构性重组。我国探索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聚焦“以人为本”“空间重塑”“制度赋能”，契合地域再生理论中“主体创造”“场所创造”“条件创造”三大创造性，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实现了对其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内涵。

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性宗旨，即以人为本

该模式始终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能够公平、持久地惠及所有农民。片区

组团通过设立跨村联合党委或党建联盟，打破了原有村庄的治理壁垒，这一主体重构使乡村从分散治理迈向协同治理，使村际之间的利益格局更加协调、乡村治理体系更加稳健有序。同时，片区发展过程中还通过建立健全利益联结与共享机制，保障农民在规划、建设、治理、受益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有效激发了农民的家园认同感与参与积极性，更赋予了乡村发展以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与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乡村善治与共享发展方面的显著优势。

2. 构建网络化与融合性的发展格局，即空间重塑

该模式突破传统村庄边界，以重点村为核心节点，通过交通网络、产业链条、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机衔接，构建起“核心引领—轴带辐射—全域联动”的空间结构。具体而言，在物理空间上，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缩小村际距离；在产业空间上，依托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分工协作体系；在治理空间上，建立跨村联建组织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决策。

3. 创新多元化与协同性的制度供给，即制度赋能

该模式通过构建跨村联建、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等多元化协同机制，打破了传统村庄单元的行政壁垒与资源分散格局，有效整合了片区内的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设立跨村联合党委或产业联合体等组织形式，强化了村际间的沟通协调与集体行动能力。同时，片区土地政策上也实现突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扩大，闲置资产交易收益的60%反哺片区公共服务[①]，形成良性资金循环，确保了农民在片区组团发展中的长期收益权，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外，在跨区域的收益分配中，片区组团明确权责边界、构建协商机制、健全利益联结制度，有效促进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与行动协同。这种制度设置不仅提升了片区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综上，借鉴地域再生理论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语境。其关键在于，将理论所强调的核心内涵与实践维度等理念，与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发展阶段及共同富裕的目标相结合。基于此，本文构建“主体—环境—产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旨在系统阐释片区组团驱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二）“主体—环境—产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

1. 主体重塑

乡村发展的根本在于人。地域再生理论强调“荣誉感空心化”概念，认为本地居民在村落衰退过程中，丧失对村落未来发展的希望，找不到村社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进而造成村落空心化。该理论所揭示的问题在面临人口流失与产业衰退的乡村片区中同样存在，且因传统村域界限而更显复杂，常表现为村际利益藩篱、资源竞争矛盾以及集体行动意愿的弥散性消解。因此，片区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多元主体的系统性重塑与跨村域关系的整合。这不仅要求通过政策引导与民主协商建立制度化的跨村议事协调平台，使分散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村民意愿得以有效地整合与疏导；还需要特别发挥乡贤能人等关键行动者的示范引领与关系纽带作用，主动化解历史积弊与信任裂痕，修复并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更为核心的是，必须通过共商发展规划、共建公共项目、共管集体资产、共享发展成果等一系列实质性参与，让村民在跨越原有村界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利益相连、命运与共”。

2. 环境营造

环境是发展的载体，其营造逻辑需超越传统的村容整治思维。地域再生理论强调硬件与软件协同，特别是构建超越村庄边界的跨域沟通桥梁，以促进内外互动、激发乡村活力。对应到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中，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两个递进的层面。首先是硬件环境的一体化与提档升级。这要求以片区为单元，统筹规划与建设交通、信息、环保等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其目的在于突破单个村庄的资源约束，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为产业与人口集聚奠定物理基础，实现“宜居”层面的

① 人民论坛网：https://www.rmlt.com.cn/2025/1107/742316.shtml.

公平与改善。其次是软件环境的网络化与价值整合。这是环境营造的逻辑升华，重在主动构建片区对外的开放性。通过塑造统一的区域品牌、培育特色文化IP、搭建数字治理与营销平台，片区得以形成一个鲜明的价值标识。借此，积极链接外部城市市场、创新机构、社会资本与消费群体，将外部的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与技术流引入片区。

3. 产业培育

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引擎。片区组团的产业培育逻辑，必须摒弃依靠大规模外生投入的同质化开发模式，转而遵循地域再生理论中“村落资源保全型小规模经济”原则，即依托村庄独特生态和文化资源禀赋设计产业路径，避免大规模外生开发带来的冲击。其核心逻辑在于基于内外部联动的融合发展与系统增值。一方面，产业选择必须根植于片区整体的资源禀赋，尤其是其独特的生态基底与文化脉络，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特色产业，实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另一方面，关键在于在片区层面推动产业链的多维融合与网络化构建[14]，即通过工业融合以提升生产效率，通过服务业融合延伸产业链条以增强服务赋能，通过文旅融合激活生态与文化价值，并通过环保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据不同村庄的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分工与功能互补，促进种植、加工、服务、体验等环节的有机衔接与跨界协作，不仅能避免内部竞争，更能通过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价值重构，形成具有韧性、创新性与高附加值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同时，基于片区组团的核心思想，乡村发展并非各村孤立进行，而应在更广域范围内依托多元主体联动和多层次制度协同展开。这一过程中，主体、环境、产业三者相互支撑、互为因果。主体重塑为环境营造和产业培育提供了内生动力和人力保障，只有当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愿景和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有效推动环境改善和产业创新。环境营造则为主体互动和产业发展搭建了空间平台，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开放的价值网络不仅能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还能吸引外部资源、激发创新活力。产业培育作为核心环节，既依赖于主体能力和环境条件的支撑，又通过创造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公共服务反哺主体发展和环境优化，最终形成主体赋能环境、环境吸引产业、产业反哺主体的良性循环。这种三位一体的动态关系，既体现了乡村发展的系统性特征，又凸显了片区组团模式在破解“小散弱”困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的独特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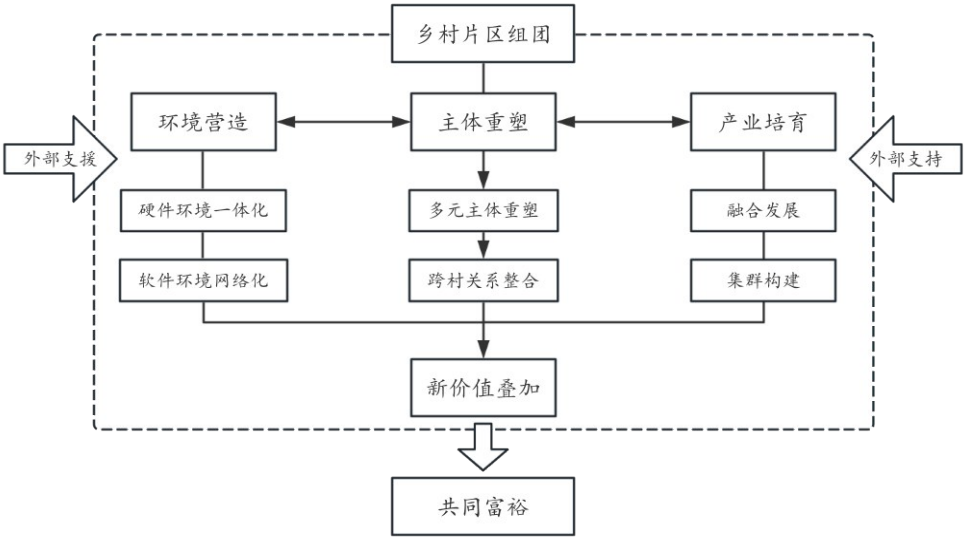


图1 “主体—产业—环境”三位一体分析框架

（三）案例分析

为深入阐释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本文选取浙江省安吉县大余村片区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安吉县大余村片区作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其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该片区以余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多个行政村，通过主体重塑、环境营造和产业培育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从单一村庄发展向片区组团发展的跨越。

在主体重塑上，大余村片区通过组织重构与机制创新，打破行政与资源壁垒，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该片区成立余村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实施“五统四分”机制，强化统一规划、建设、布局与督考，实现片区发展“一盘棋”。同时，创新“四类人群”服务体系，聚焦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与旅乡人的差异化需求，系统提升各类主体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参与感。通过实施“全球合伙人”计划、建设“青来集”青年社区、组建全球青年发展学院与数字游民公社等载体，大余村构建了“云村民—数字游民—全球合伙人”的渐进式人才引育体系，吸引1200余名青年常态入驻[①]，推动乡村运营主体向年轻化、专业化、国际化转型。此外，浙江省启动“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目标直指培育一批懂市场、善经营、能扎根的专业化乡村经营管理人才。已有超过70%的学员投身乡村经营一线，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细胞”的关键力量[②]。

在环境营造上，大余村片区以“全域景区化、沿线景观化、村庄景点化、庭院小品化”为导向，统筹推进生态、设施与人文环境整体提升。片区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实施15公里景交公路、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至云上草原索道、熊猫部落探险乐园等重点项目，联动“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与“国际山地旅游度假区”两大核心资源，全力构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生态文化氛围塑造方面，深入推进“O_2生态文化圈”计划，举办理查德·克莱德曼国际钢琴音乐会、国家级“两山”户外运动多项赛、长三角露营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活动，打造“一年四季 余村等你”的全季文旅品牌。同时，片区注重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挂牌设立国际传播平台观察点与研究基地，签约多家头部媒体，宣传内容点击量超4亿，并成功推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余村星”小行星，显著提升了片区的国际辨识度与文化软实力。

在产业培育上，余村片区以“新农业、新文旅、新经济”三大产业为支柱，推动业态融合与价值提升，构建了可持续的共富产业体系。片区依托“余村大景区”与“青年大社区”两大平台，积极孵化培育生态露营、山野咖啡、非遗文创、国漫动画等多项新兴业态，2024年游客接待量突破千万人次。通过深化“两入股三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村集体与村民以资产、资源量化入股，形成租金、薪金、股金等多元收益结构，并组织24个行政村与余村集团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协议[③]，以国企收储盘活资产实现利益共享。此外，片区全力招引科技型、平台型、总部型项目，累计落地邻汇吧、云梯科技、承影互联等新经济与合伙人项目60余个。2024年，大余村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254万元，同比增长11%[④]，实现了从“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的系统转化，探索出了一条以产业振兴驱动片区共富的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安吉大余村片区的实践证明，共同富裕是片区组团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必然归宿。通过主体重塑，它打破了行政与社会的壁垒，凝聚了共富的合力；通过环境营造，它构筑了普惠共享的优质生活空间，奠定了共富的基石；通过产业培育，它构建了差异化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创造了共富的源泉。这些实践不仅彰显了片区组团模式在破解“小散弱”困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的独特优势，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乡村发展需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

① 数据来源：中国青年报.以前是“一根网线走天下”，现在是一群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如何留住“全球合伙人”[EB/OL].(2025-04-10)[2026-01-15].https://news.youth.cn/gn/202504/t20250410_15933612.htm.

②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新职业点燃共富新引擎”探路“浙江CEO浙江先行一步[EB/OL].(2025-08-01)[2026-01-15].http://www.brand.zju.edu.cn/2025/0801/c57338a3072676/page.htm.

③ 数据来源：湖州日报.余村集团获评浙江产业类“AA+”主体信用评级[N/OL].(2025-03-14)[2026-01-15].https://szb.hz66.com/hzrb/html/2025—03/14/content_117517_18342940.htm.

④ 数据来源：浙江日报.打造绿色共富的乡村生态圈[EB/OL].(2025-03-11)[2026-01-15].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5—03/11/content_3810342.htm?div=—1.

续性，通过主体、环境、产业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

四、现实困境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作为一项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的复杂工程，其理论逻辑清晰，实践价值显著。然而，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来自空间、主体与要素等多个维度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着片区组团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与联动耦合效应的充分发挥，更从根本上削弱了其促进收入增长普惠、发展机会公平、公共服务均等等共同富裕核心目标的预期效能。

（一）片区主体协同的“联动之困”

片区发展的成功依赖于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网络。但现实中，各主体的目标离散与协同不足，可能导致发展成果的共创与共享机制难以健全，影响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属性。

1. 行政主导与多元参与失调，导致共建格局难以形成

在强政府推动下，片区规划与产业选择可能偏离市场规律与村民真实需求，造成资源错配。更重要的是，村庄与村庄、村民与村民之间冲突的根源，往往在于“自认为的‘对集体贡献得多，得到的收益分配少’”[15]。这种对公平的感知落差，使得跨村协作大多停留在浅层的劳务协作，生产性协作关系网络较为薄弱，无法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其结果是，发展红利难以在片区内部进行有效涓滴和共享，强村与弱村、参与主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在组团名义下被固化甚至拉大，背离了“先富带后富”的顶层设计。

2. 农民主体性虚化与隐性矛盾，动摇共治共享根基

普通农民在片区重大决策中缺乏话语权，其利益诉求易被忽视，导致“干部在干、群众在看”[16]。同时，大多数矛盾处于隐性状态而难以被发现，但其长期存在则持续消耗社会资本，破坏信任基础。当村民无法在共建中有效参与、在共治中公平发声、在共享中合理获益时，其内生动力必然受损。这不仅使得共同富裕缺乏最广泛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支撑，也使得片区发展因内部凝聚力不足而难以持续，共同富裕沦为无源之水。

（二）片区空间适配的“统合之困”

片区组团的深层目标，在于通过空间的再组织促进发展成果在更大范围内的普惠共享。然而，实践中行政区划的刚性壁垒与资源禀赋的初始差异，使得片区内部易于形成并固化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梯度，导致强村与弱村之间的关系呈现脱嵌状态，难以迈向实质性的联动发展与共同富裕。

在物理空间层面，基础设施“硬联通”的不均衡与数字化“软接入”的短板交织叠加，未能有效弥合村际差距，反而可能强化弱村对强村的依附性发展。强村凭借先发优势与政策倾斜，普遍拥有更完善的实体设施网络与更高水平的数字服务能力[17]；而弱村则在交通、物流、教育等传统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覆盖、数据应用等数字基础方面均显著滞后[18]。这种双重劣势制约了弱村获取信息、应用技术、共享发展红利的能力，使其在片区发展中处于被动依赖地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动共富。

在治理空间层面，政策资源供给往往采取差额竞争方式，往往对优势村庄进行政策叠加供给，加剧了乡村内部建设水平的分化，使得强村在公共品牌塑造、产业布局等关键决策中拥有更强话语权[19]。同时，自上而下统一的建设目标与进度要求限制了地方塑造差异与特色的能动性，以行政权属而不是地域功能来划分治理单元，使得乡村发展单元间缺少横向协同机制。其结果是，规划共绘、产业共兴、服务共享多停留在愿景层面，发展红利难以在村际间进行公平、有效的二次分配，这与“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共富逻辑背道而驰。

（三）片区融合发展的“赋能之困”

乡村产业的有效协同与价值共享，是片区组团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经济基础。然而，当前片区内部产业发展协同机制不健全、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导致产业联动效能难以充分发挥，制约了片区整体的经济活力和共富能力。

1. 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削弱了片区整体竞争力

由于缺乏统一的产业规划和协同发展机制，

各村往往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盲目发展相似的产业，导致产品和服务高度重叠，市场饱和度过高。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还引发了恶性竞争，降低了片区整体的经济效益。此外，部分探索融合产业的片区大多停留在产业的简单叠加或拼接层面，缺乏深度的化学反应和价值重构，难以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限制了片区整体的经济效益和共富能力。

2. 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影响了产业协同的积极性

在片区组团发展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往往缺乏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强村在产业合作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获取了大部分的发展红利，而弱村则因话语权不足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分享到产业升级带来的收益。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仅削弱了弱村参与产业协同的积极性，也破坏了片区内部的团结和信任，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0]。

五、实践路径

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是深化“千万工程”、促进城乡融合、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工程，其实践成效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和城镇贫富差距的持续缩小与全体农民民生福祉的系统性提升。为将理论逻辑有效转化为实践成果，并切实破解当前面临的联动之困、统合之困与赋能之困，本文以“主体—环境—产业”为三大核心支柱，构建以党建联合引领多元主体协同、以空间正义夯实片区组团发展、以统分结合激活产业联动效能的实践路径，旨在通过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与发展模式的集成创新，全面激活片区组团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潜能，使其真正成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载体与强劲引擎。

（一）以党建联合引领多元主体协同

实现共同富裕，首要在于构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发展共同体。早期乡村“单打独斗”的模式导致资源分散、内耗严重，而片区组团发展则要求各村从孤立竞争转向深度协同。这一深刻转型，亟待一个能够超越单一村庄利益、统筹多方资源、凝聚共同意志的坚强核心。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纽带，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力与价值引领力，近年来地方逐步探索出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以跨组织协同为手段，以资源整合为路径，形成如“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村企共建”“跨村联建”“毗邻党建”等党建联建模式[21]，有效打破了行政区划壁垒，整合了区域资源，呈现出党的坚强领导下基层活力充分释放、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的积极态势。这些成功实践表明，党建引领是破解当前“联动之困”、将分散主体凝聚为统一行动合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片区的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具体而言，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必须建强一个实体化、职能化的片区联合党委作为核心领导力量。第一，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该党委应由上级党委领导兼任书记，整合乡镇、村社、平台企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并设立常设机构与专职人员，对跨村规划、重大项目、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项行使实质统筹权，从根本上破解“联而不统”的难题。第二，创新“党建＋市场”融合机制与公平的利益联结体系。由联合党委引领并监督成立片区强村公司等市场化运营实体，在明确其特别法人地位、赋予必要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利益分配需依据各村资源资产入股、劳动力输送、土地供给及环境保护等贡献度进行量化核算。监督制度则需构建由联合党委纪委牵头、第三方审计与村民代表共同参与的常态化监督体系，重点对运营成本、交易合规及利润分配进行审计与公示。第三，构建多元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定期召开片区发展联席会议、设立村民议事厅等形式，确保各主体能够充分表达诉求、平等参与决策。联席会议由联合党委主持，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代表共同参与，围绕片区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实施、利益分配方案等关键议题进行协商讨论，形成共识后付诸实施。村民议事厅则作为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载体，由村民自主推选议事代表，定期就村内事务进行民主议事，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落实。

（二）以空间正义夯实片区组团发展

片区组团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空间策略，其成效不仅仅取决于物理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还依赖于治理机制、公共服务与品牌价值等

软件连接的深度整合。单纯的空间集中若缺乏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关系重构，极易固化既有梯度，导致强村与弱村之间的发展脱嵌，与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将空间正义思想嵌入片区统筹发展的根本标尺与行动框架。该思想强调空间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发展机会的均等享有以及多元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22]。将空间正义确立为片区统筹发展的根本遵循，旨在针对性地纠偏“统合之困”中暴露的问题。它并不是指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撒胡椒面”的形式分布在各个村庄，而是在充分尊重各村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功能角色差异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化的调节机制，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动态的公平。它旨在确保资源要素能在片区内部公平而高效地流动，使弱村的发展权利得到保障、特色价值得以彰显，使强村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得以发挥，最终在各美其美的差异化发展中，实现美美与共的整体性繁荣，夯实共同富裕的空间基础。

具体而言，以空间正义统筹片区组团发展，需构建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一体化公平实践体系。第一，以协同发展规划为引领，构建差异化功能互补的公平空间秩序。编制统一的片区协同发展规划，核心在于以空间资源的均衡配置与功能的差异互补，引导片区走向公平有序发展。规划编制必须基于对各村资源禀赋、发展潜力与约束条件的系统性评估，并通过建立由规划专家、村干部、村民代表及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协商论证机制，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第二，以均等化服务与智慧基建为重点，夯实机会公平的硬件与软件基础。一方面，必须建立片区财政统筹与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制定并强制实施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最低配置标准与服务规范，并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对弱村达标建设与运营予以倾斜支持。另一方面，要将覆盖全域的数字化新基建作为缩小数字鸿沟的攻坚工程，优先在弱村布局5G基站、物联网、乡村数据中心等设施。同时，需构建片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探索强村帮弱村的设施托管、人才派驻与技术帮扶模式，通过“硬联通”的均衡布局与“软接入”的普遍赋能，切实提升弱村居民获得发展机会的能力。第三，以品牌共塑与利益调节为核心，建立发展成果公正分配的协同治理机制。在品牌共建与协同治理层面，必须构建坚实的利益共生与调节机制。要着力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片区公共品牌，并设计透明的品牌使用与管理规则，允许并鼓励弱村以其特色产品、非遗文化、生态景观等资源嵌入区域价值链，共享品牌溢价。

（三）以统分结合激活产业联动效能

共同富裕植根于坚实的产业基础与公平的利益共享。若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撑，片区发展将失去核心引擎，农民增收渠道便会狭窄且脆弱；若缺乏公平有序的利益共享机制，则发展成果难以普惠，会侵蚀社会认同、削弱内生动力，最终导致协同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必须寻求一种能兼顾产业增产效能与利益分配公平的组织创新。面对这一根本性要求，“统分结合”的运营体制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框架。“统”是整合分散资源，通过建立片区统一运营平台，在品牌、标准、渠道、技术等关键环节实现规模效应与战略协同；“分”是激发多元主体的积极性，通过保障基层经营自主权，充分释放各村、各类市场主体在具体生产、服务与创新上的活力与效率，避免因“一刀切”而扼杀多样性。这一体制旨在以“统”提效率、以“分”保活力，破解“赋能之困”中产业低端同质与利益分配失衡的双重困境。

具体而言，推进“统分结合”需要从两方面系统构建[23]。第一，强化“统”的功能。片区统一运营机构应聚焦于全局性、基础性事务，实现关键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其核心职能包括基于对片区整体资源禀赋与市场趋势的研判，制定并动态调整产业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塑造与运营具有高辨识度的区域公共品牌，并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与溯源体系；统筹投资建设共享的仓储物流中心、冷链设施、精深加工园区等关键基础设施；搭建面向全片区的技术研发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人才培训与质量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以上举措，旨在降低各村各经营主体单独应对市场的成本与风险，提升片区产业的标准化、组

织化与品牌化水平，从根本上破解产业“小散弱”和同质化竞争的问题。第二，保障“分”的活力。必须在制度上充分保障各村集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创客及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明确其在本村特色种养、传统工艺生产、民宿餐饮运营、乡村文旅体验、社区生活服务等具体环节的主导地位，鼓励基于本土知识与资源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统一运营机构与分散经营主体之间，应通过规范的股权合作、长期订单契约、品牌授权使用、服务外包协议等市场化方式，建立稳定、透明的协作关系。统一平台负责提供品牌、渠道、技术与金融等支持，而不干预其具体经营，以此形成平台赋能、自主经营的良好生态，避免因过度统筹而扼杀基层多样性、压制微观效率。第三，在激发活力的同时，必须构建强有力的利益联结与调节机制，确保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统一运营机构要通过清晰的股权合作、订单农业、服务外包等市场化契约，将分散主体紧密联结起来，并牵头建立收益调节机制，从整体利润中提取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弱村发展、帮扶低收入群体，从而在激发微观活力的同时，确保发展红利在片区范围内实现公平共享，将资源禀赋切实转化为可持续的共富源泉。

参 考 文 献

[1] 王薇，刘惠．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现状和策略研究——以示范区11省份为例[J]．农业经济，2023（7）：92-94.

[2] 王辉，陈嘉怡．乡村精英回嵌何以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贵州省S村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6，23（1）：90-101，172.

[3] 武前波，张庆禧，吴诗雨．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县域乡村连片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规划应对[J]．规划师，2025，41（11）：17-24.

[4] 高强，张海为．县域城乡融合背景下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模式比较——以山东荣成、江苏张家港和广东英德为例[J/OL]．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7.[2026-01-15].

[5] 胡小武．收缩或是扩张：中国城市发展的类型化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3）：157-168.

[6] 李琬，李如茵，孙斌栋，等．中原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J]．地理学报，2025，80（8）：2143-2158.

[7] 柳卸林，王宁，吉晓慧，等．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J]．中国软科学，2022（4）：76-86.

[8] 李晓军，郭雨露，何微丹，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都市地区村庄“群落化”规划探索——以广州从化米埗乡村群规划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0（3）：38-45，53.

[9] 高仓健，冯相龙，顾莉莉，等．“多村联创”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1，49（13）：256-259.

[10] 刘帅婕，苏昕．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4）：59-69.

[11] 杨晓婷，倪国华．党的组织力何以助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情景—主体—策略—制度”的解释框架[J]．学习与实践，2024（7）：39-49.

[12] 苗延义．农民主体性：乡村新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基础——以浙西橘溪“画村打造”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25（12）：261-270.

[13] 小田切德美．挑战农山村再生：从理论到时间[M]．东京：岩波书店，2013.

[14] 饶旭鹏，赫英强．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困境检视及发展对策[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6）：37-47.

[15] 侯鹏，赵翠萍．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片区化发展：基础要件、现实挑战与对策[J]．世界农业，2025（4）：30-39.

[16] 于法稳，张康洁．地域特色与现代元素融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研究[J/OL]．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2026-01-15].

[17] 徐晓春，蓝菁．片区组团视角下村镇体系构建及振兴路径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25，44（1）：117-130.

[18] 李韬．乡村治理中“择优发展”路径的实践困境与调适策略[J]．江汉论坛，2025（10）：45-52.

[19] 王鹏,罗小龙,王佳．从互动失衡到结构重塑:乡村连片发展的转型思路与规划探索[J]．规划师,2024,40(9):107-115.

[20] 杨果，胡晓燕，万凌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J]．农村经济，2025（4）：61-69.

[21] 穆军全，张丽敏，王辉．党建联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类型划分、绩效比较及其机制优化[J/O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6-01-15].

[22] 徐小容，杨雨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空间正义逻辑与发展路向[J]．教育研究，2024，45（6）：

148-159.
[23] 杨忍，杨文，葛语思，等.中国乡村发展与建设片区组团化的理论框架与规划技术[J].规划师，2025，41（12）：47-54.

Theoretical logic，practical dilemmas，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rural area clustering for common prosperity

Lu Honggang[1,2]，Wang Juan[2]，Wu Liancui[1,2]

（1. *Zhejia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A&F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A&F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China*）

Abstract：In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 clusters is regarded as a key pathway to break down barriers between villages and promote regional coprosperity.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regeneration，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gent - environment - industr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logic，practical dilemmas，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rea clustering fosters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ural clustering，through agent restructuring，environmental enhancement，and industrial cultivation，aims to achieve intervillag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regional value cocreation. However，in practice，it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coordination"，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on"，and the "difficulty of empowerment"，which are manifested mainly in insufficient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imbalanced spatial adaptation，and lagg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all of which constrain the commonprosperity effects . Accordingly，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partybuilding alliances should guid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spatial justice shoul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development，and a unified yet flexible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activate industrial synergy. These measure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rural area clusters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Area clustering；Regional regeneration theory；Common prosperity